

附件 2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结项申请书

立 项 编 号 B Z 2 5 Y B 0 4 3

项 目 类 别 中 国 历 史

项 目 名 称 巴 中 “ 四 龕 环 城 ” 分 布 格 局
 的 历 史 与 现 实 意 义 研 究

项 目 负 责 人 李雪梅

所 在 单 位 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填 表 日 期 2025 年 5 月 20 日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制
2025 年 3 月

声 明

本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享有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特此声明。

成果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是☐ 否☒
☒ 成果是否涉密： 是☐ 否☒

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5 年 5 月 26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巴中市社科年度规划项目、专项项目等结项申请。

二、认真如实填写表内栏目，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项上打“√”。课题申报信息无变更情况的可不填写《项目变更情况数据表》。

三、本《结项申请书》报送 2 份（A3 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并附最终成果打印稿（正文格式要求：主标题 2 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其中一级标题 3 号方正黑体-GBK，二级标题 3 号方正楷体-GBK，三级标题 3 号方正仿宋-GBK 加粗，正文 3 号方正仿宋-GBK）。

四、所有结项材料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县（区）申报者报送所在县（区）社科联审核后统一报送至市社科联，其他申报者可直接报送市社科联。

一、项目变更情况数据表

立项项目名称											
结项成果名称											
是否变更		A、是 B、否		变更的内容							
原计划成果形式						现成果形式					
原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变更情况											
原 负 责 人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现 负 责 人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原 参 与 人 员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现 参 与 人 员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课题不存在政治导向问题和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同时，课题围绕巴中“四龕福城”文旅品牌打造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研究团队通过梳理石窟寺在巴中的分布情况，分析唐代巴中地区石窟造像活动兴盛的原因，厘清了城周四龕的规划布局与选址特点，分析了四龕与巴城互为依存、互为促进的共生关系，阐释了四龕在巴中城市中发展中的内涵增值作用及“四龕环城”的现实意，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符合预期研究目标。

签 章

2025 年 5 月 26 日

三、县（区）社科联意见

（审核事项:1.成果有无意识形态问题；2.是否同意结项。）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四、专家鉴定意见

(请在对应意见栏划“√”)

1.成果有无意识形态方面问题： 有 ☐ 否 ☐

2.是否同意结项：是 ☐ 否 ☐

3.鉴定等级：优秀 ☐ 良好 ☐ 合格 ☐

主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五、市社科联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巴中石窟“四龕环城”分布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研究

【摘要】 巴中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处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为古代南北交通道路—米仓道的必经之处，中原入川的要道。石窟造像得风气之先，环城四周山崖间皆有石窟造像群成规模分布，形成了巴中南龕、北龕、西龕、东龕石窟“四龕环城”的独特地理格局和石窟与城市共生的文化现象，这种分布格局无论是在开窟造像的隋唐时期还是文化强国的当今时代都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通过梳理石窟寺在巴中的分布情况，分析唐代巴中地区石窟造像活动兴盛的原因，厘清城周四龕的规划布局与选址特点，分析四龕与巴城互为依存、互为促进的共生关系，阐释四龕在巴中城市中发展中的内涵增值作用及“四龕环城”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巴中石窟 四龕环城 分布格局 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巴中石窟造像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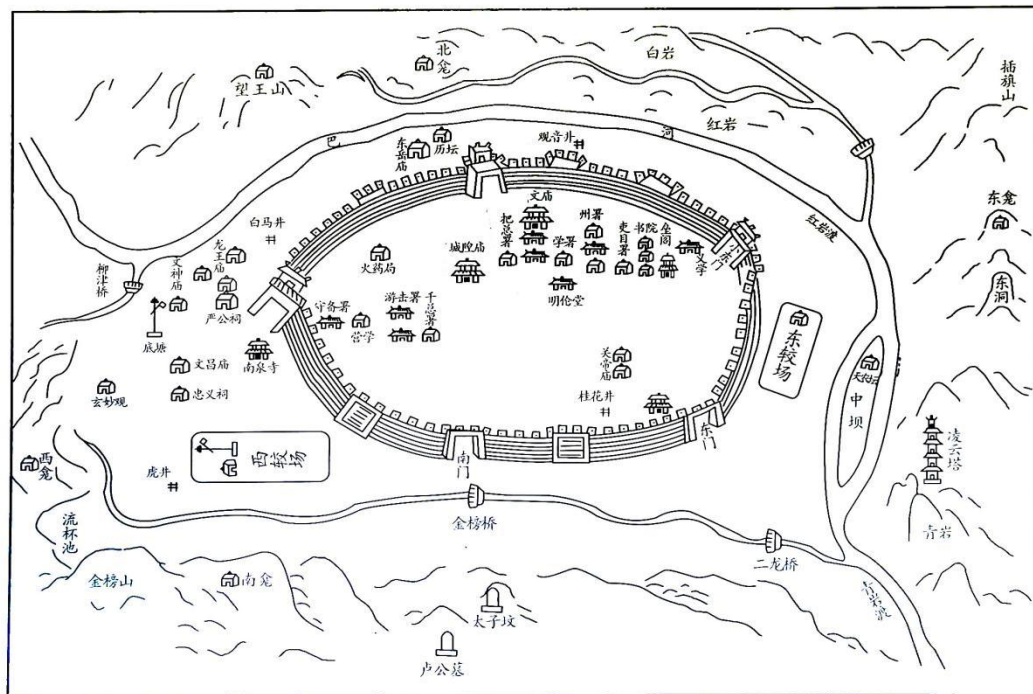
（一）巴中石窟资源

巴中石窟文化资源丰富，境内现有石窟造像 225 处，1200 余龕，14000 余尊。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3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170 处。从内容上看，巴中石窟造像多为佛教题材，如释迦说法、弥勒说法、西方净土变、菩提瑞像、七佛、千佛、观音、地藏、鬼子母等；也有少量道教和佛道融合题材，如玉帝、天尊、天尊与女真、释迦与天尊等；从造像时间上看，大多为唐代遗存，少量隋代、宋代、清代及民国时期造像；从分布上看，除了乡间田野、沟壑山林的零星分布外，城周四面集中分布了东龕、南龕、西龕、北龕四个精美的石窟造像群，形成了巴中“一城四龕”的石窟造像分布格局。

（二）四龕的历史记载和现实状况

晚清巴州城图

(1833年)



这是一张清道光年间的巴州城垣图，图上清晰标注了巴州城的主要建筑和四龕的位置，从图上也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巴州城是依山傍水修建在巴河南岸的，四龕则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环绕着巴州城开凿营建，由于巴河的分隔让东龕和北龕处在了江北、西龕和南龕处在了江南，是巴中千余年来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关于四龕，历史上多有记载：唐乾元年间的巴州刺史严武曾主持修葺南龕寺，并在上疏肃宗皇帝的奏表中奏陈了南龕石窟“500余铺”造像的状况；南宋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中详细记载了城周四龕的位置分布情况：“东龕在自江东岸巾子山下，即唐兜率寺，寺废而碑存焉。西龕在城西二里，益郡治之主山也。南龕在州南二里，鑿石为佛。大（北

龕)在郡北五里,俯瞰巴江,小(北龕)在郡北五里風帽山之下,岩如屋。”^[1];明代曹學佺所著所著《蜀中名勝記》中也涵蓋了巴城四龕的名勝古迹:“城外東龕在字江東?巾子山下即唐兜率寺寺廢碑存。西龕有古墨岩,在懸崖上有壯觀二大字,云是李太白筆…南龕有廣福寺,志云唐時建有乾元年間契書…北龕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馬泉…”^[2];清道光年間,巴州知州朱錫谷在修編的《巴州志》中同樣收錄了環城四龕:“東龕山在州東十里巴江東岸…南龕位於州南二里…西龕山在州西二里…北龕在蘇山之麓,距州城五里。”^[3];清光緒年間,巴州廩生趙墉題留在南龕的一則修繕記中以“…巴州去嘉陵較遠而山水尤奇,故環城四龕皆稱絕妙…”^[4]首次提出了“環城四龕”的概念,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關注四龕奇特的分布格局了。

從四龕的現狀來看,東龕石窟現存殘龕8個,1號龕保存相對完好,具有明顯的初唐造像特徵;南龕石窟規模最大,造像分布集中,現存有編號的龕窟176個,有記載的最早造像紀年為唐開元二十三年;西龕石窟現存有編號的龕窟92個,造像主要分布在佛爺灣、流杯池和龍日寺3處,有記載的最早造像紀年為隋大業五年;北龕石窟現存有編號的龕窟34個,雖尚未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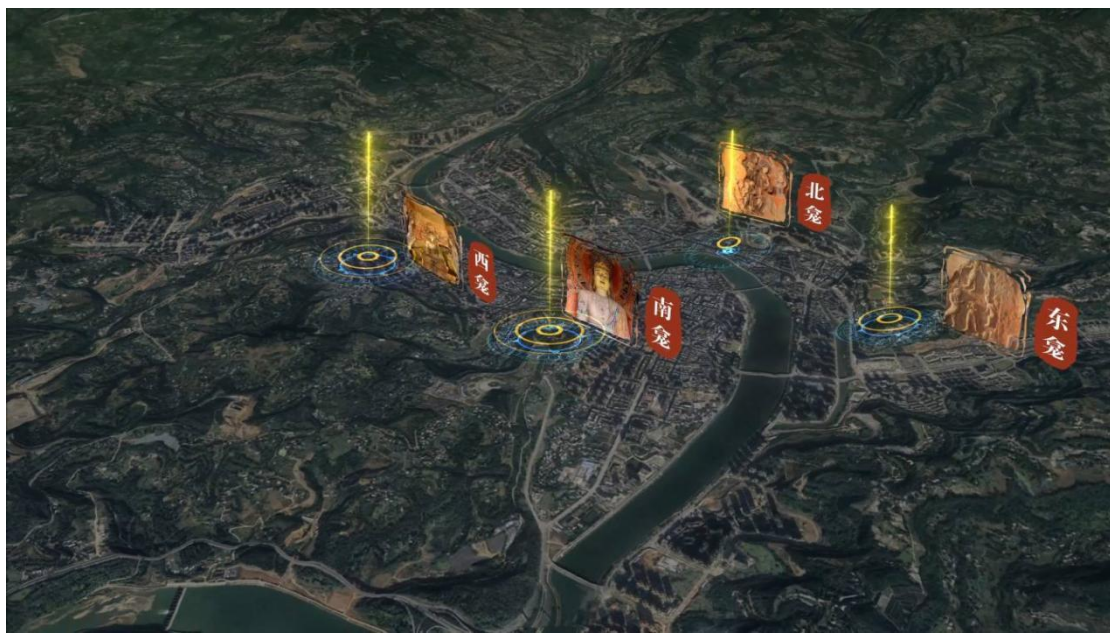
[1]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八十七《利東路·巴州》,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刊板,第2510頁。

[2] 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劉知漸點校本),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年,第372頁。

[3] 朱錫谷:《巴州志·山川》(重印本),巴中,2002年,第61頁。

[4] 趙墉:《南龕修繕記》碑現存於南龕石窟89號經幢龕外龕左壁。

现有唐代造像铭文，但多龕造像均具有初唐风格。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今的四龕早已与巴城融为一体，成为巴中独有的城市石窟文化景观。



四龕在当今巴中市所处的位置图

（三）巴中具有四龕环城分布格局的唯一性

就全国各地石窟寺建造地而言，附近有石窟寺的城市不在少数：比如洛阳市郊有龙门石窟、大同市郊有云冈石窟、乐山市郊有乐山大佛等等；有的城市附近也分布有几座石窟寺：比如广元，城北四公里处有千佛崖石窟、城南 15 公里处有观音岩石窟、城西 1 公里处有皇泽寺石窟，但城市北面无石窟寺分布，并未形成石窟寺四面环城建造之格局。再如资中，石窟造像虽有“四岩”之说，但它主要指的是在资中县不同方位的四处石窟群，其中的南岩石窟距离县城有 60 多里，固然谈不上环城分布。可以说石窟寺造像紧密环城分布的格局，巴中具有唯一性，

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二、巴中石窟造像活动兴盛的主要因素

巴中众多的隋唐石窟寺遗址遗迹说明巴州在隋唐时期的石窟造像活动十分兴盛，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交通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治因素。从大的政治环境来看，石窟寺造像活动的兴盛与隋唐统治者对佛教推行扶持政策有极大关系。隋朝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两代帝王都笃信佛教并大力扶持佛教。唐代的皇族对佛教同样是多持崇奉态度，让佛教在中国走上了鼎盛时期，“有唐一代，除了唐武宗外，其余二十个皇帝（包括武周，不算哀帝）都对佛教有不同程度的提倡和推广。”^[5]因此，佛教石窟造像活动也在唐代盛极一时；从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战乱频发，从而又抑制了造像活动的开展。自唐代中期安史之乱至唐末黄巢农民起义，中原北方地区长时间饱受战火摧残，加上会昌年间唐武宗推行“灭佛”运动，使得大量僧人、工匠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到相对安宁的蜀地。特别是玄宗、僖宗两位帝王都曾因战乱入蜀，一些王公大臣、画工匠师、信徒僧侣、文人雅士也纷纷南逃入蜀，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也带动了佛教造像活动的兴盛。广元、巴州作为入川门户，自然成为了这些北来之人开龕造像的首选之地。政治影响着石窟寺的兴盛，同样也会导致石窟造像

[5] 冯棣：《巴蜀摩崖文化建筑环境研究》，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9月。

活动的衰落。比如在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巴蜀地区也经历了抗击蒙古入侵和张献忠入蜀等战乱，因此，巴州在元明两代就几乎没有过大规模的石窟造像活动。

（二）文化因素。如前所述，唐代巴州佛教文化的兴盛固然离不开中原和北方地区南逃之人的传播和影响，但也与巴州自身肥沃的文化土壤有着极大关系。从宗教信仰上看，巴州是巴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中心区域，自古便存在祭天、祭地、祭水、祭图腾、祭祖先等宗教祭祀活动，当佛教传入巴蜀后，大多数人会愿意选择接受佛教；从文化内涵上看，古老巴文化中包含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形式多样的文学艺术与石窟寺造像仪轨中的内容多有相通之处，便于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进而信奉佛教；从雕刻技艺上看，巴文化中同样包含了较高水平的绘画和雕刻艺术，在现存的一些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常常可以看到如几何纹、动物纹等精美的图案和纹饰。在巴州本地匠师的眼中，石窟造像虽为外来艺术却并不陌生，因此，本地众多优秀匠师也成为了巴中石窟寺镌造的主要力量。

（三）交通因素。巴州在唐代的交通地位比较突出。一方面，巴州是古代南北交通道路米仓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米仓道北接长安，从汉中兴元府经集州可到达巴州。当时著名的丝绸之路从西域至河西走廊南下后经秦州向东南，也是在兴元府境内与米仓道南段相合进入巴州，再从水路南下至重庆，并顺

江到达长江下游。米仓道的繁华带动了米仓道沿线石窟寺造像活动的兴盛；另一方面，巴州是京城连结东、西川重要通道上的节点城市：唐代巴州在陆路上又与东、西川节度使治所梓州、成都处在一条线上，特别是随着玄宗入蜀形成长安、成都二元政治格局后，这条通道更加凸显了生机活力。巴州因为陆路、水路交通都相对发达而成为了佛教文化从西域和中原传入蜀地的前沿和北方南逃之人比较理想的落脚立足之地，特别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因战乱原因，长安、洛阳的官员多追随帝王而至，带来了佛教造像的“两京”式样，因此巴中城周四龕又有“两京华彩 四龕耸秀”的美誉。

三、巴州四龕环城分布格局的形成

（一）巴城具备城镇建设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巴州古称汉昌、归化、大谷、清化，始建于自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拥有1900多年的建城历史，自北魏延昌三年（514年）置巴州，作为州、府治所地也有1500多年历史。从地理环境而言，巴州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地处中国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南，多低缓丘陵地貌，境内大小河流1100多条，属于“群山雄峙，巴水环流，扼险据岩，梁益要地。”^[6]城池所处的位置四面环山，中间开阔平坦，适宜农田开垦、城镇规划和交通建设；城外巴河蜿蜒流淌，为生活在巴城的居民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和便利的交通。这在科学技术

^[6] 《巴州志校注·形胜》（重印本），巴中，2002年，第59页。

不发达、难以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历史时期，巴州城的建造选址十分符合古代城镇建造高度依赖天然地理格局的选址标准。宋嘉定年间，巴州知州赵希璜曾在《季春下浣遊南龕》^[7]一诗中以“四山如蝟毛，中有线路萦。何人导我来，得此掌许平。”形象描绘了青山环抱巴城的地理环境。又以“少间上绝顶，四望围长城。涨江笼篆文，小市分棋枰。”道出了俯瞰巴城平坦如棋盘的感受；《巴州志》中也有“州，万峰环绕，独于凤谷山下展平一二十里，坐一城于其中而拱卫之。是方隅地脉之所蟠结荟萃也。”^[8]关于巴州城池的地理环境记载。所谓“拱卫”即环绕在周围保卫、护卫的意思，明确说明了四山之于巴城的意义。同时，一条发源于发源于米仓山深处，最终汇入长江支流渠江的巴河也让巴州城因为有了便利的水路交通而更加繁华，唐代王勃、李白、岑参、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曾依靠水上交通到过巴州，并留下了泛舟巴河的优美诗篇。宋代巴州通判冯伯规在《次韵泛舟仲秉有诗》^[9]中以“是处壶中别有天”来赞叹巴州山水相间的美景如同人间仙境。由此可知，巴州城所在之地确实具备建立城镇的天然地理条件，也因此成为了自北魏延昌年间置州以来的历代州府治所所在地。

（二）城周四山是佛教信士参禅礼佛的首选之地

一直以来，石窟寺与寺院都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

^[7] 《季春下浣遊南龕》诗刻现存于南龕老君洞内壁。

^[8] 《巴州志校注·城垣图》（重印本），巴中，2002年，第37页。

^[9] 冯伯规：《次韵泛舟仲秉有诗》诗刻现存于南龕老君洞内壁。

佛教信士参禅礼佛的重要场所，在建造选址上多为山体稳固、水源充沛、环境清幽的区域，而巴州城周四山均具备石窟寺和寺观建造的自然条件。其一，巴州多低缓山地丘陵，山岩体为砂岩质地，岩质结构紧密细腻、硬度适中，特别适宜雕刻。罗惠在《麦积山石窟与巴中石窟造像比较》一文中也提到巴中的石材是适宜开龕造像的，她认为：“巴中石窟大多为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龕，巴中生产大理石、花岗石、白花石等石材，都是石刻、石雕的天然材质。”^[10]；其二，巴城东面的东华山、南面的南龕山、西面的凤谷山、北面的苏山均处在城市周围的几公里处的环境清幽之处。山内多古木，山体崖面绵延不断，山间开阔平坦，既适宜开龕造像，也是建造寺观的理想之地。因此，四山之中既有精美的石窟造像，也有古朴的寺观建筑，如东龕石窟与东洞寺、南龕石窟与光福寺、西龕石窟与龙日寺、北龕石窟与北龕寺；其三，四山环抱巴城，在交通工具不发达、多靠步行到达的时代，四山与巴城之间几公里的距离对于居住在城内的信众往返十分便利。

（三）共同信仰的延续逐步壮大了四龕的规模

巴中城周 300 多个摩崖造像龕集中分布在四山之中，颇具规模，但这种规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从隋至民国一千余年的不断保护、修缮、续镌下逐步形成的一道沉稳、厚重的历史文化景观。从宗教信仰的权威性与仪式感延续方面来看，隋

^[10] 罗惠：《麦积山石窟与巴中石窟造像比较》，《天工》，太原，2024 年第 25 期。

与初唐在四山选址零星开龕形成的小规模石窟群本身具有宗教神圣性，后代信众会将其视为“灵验之地”或“祖师遗迹”，进而产生自然的认同感和依附感，因此，大多会选择在前人造像之地镌造佛像。比如：现存南龕的93号至95号龕就是唐会昌年间的巴州刺史荣阳郑公捐资镌造，并在这几龕像的造像铭文中以“既迨巴州于郡之南山，视峭嶂斗绝，有严黄门武鑄鏤释像之所…乃立毗沙于其侧…”明确表示选择在此造像是因为间壁间有严武为父开凿的观音像。南龕的11号龕民国时期观音造像铭文中也有“…今岁秋，偕遊南龕，观神像之庄严，因而有感，特为叩许，镌献观音大士像一尊…”等关于选择在此造像的原因描述；从开龕选址的技术传承上看，前代开龕的勘察、选址、雕刻技术为后代提供了实践参考。通常情况下，早期的开龕者都会通过试凿、观察岩性裂隙等方法来判断石材硬度与耐久性，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让后辈在开龕选址上能够有效规避龕窟坍塌等地质风险，提升了开龕造像的安全系数；从石窟造像中的佛教人物形象塑造上看，无论是造像的内容，龕窟形制、龕内布局，还是服饰纹样等方面，已有龕窟都为后辈匠师提供了最真实的范式，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佛像风格，但在同一地点的后代龕窟中总会找到一些前代的特征，好比南龕的大佛洞片区的造像，明明不在同一年代，却总有一种是出自同一匠师之手的感觉，其实这就是对雕凿技艺的一种创新性传承。正是基于对前人选址造像之地的认同、依附和造像技

艺的传承、创新，才有了如今“堪称绝妙”的环城四龕。

四、环城四龕在历史上与巴城的共生关系

（一）在建造选址上存在互为补充关系

根据史料记载，巴城自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始置巴州，作为州、府治所地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境内现存最早石窟造像纪年为隋大业五年（609年），距今1400多年，从时间上看，巴城的建造时间比环城四龕的始凿时间略早，因此，四龕开凿选址的主体应多为居住在巴城的居民。他们选择紧邻城市建造石窟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一个“便于”问题，既便于为石窟寺建造提供所必须的人力、物力，也便于居住在城内的信众前往石窟寺礼佛膜拜。比如：北龕11号达摩祖师龕外造像记“巴州北门内信士弟子李广有、李自芳、叶氏、王冈用、李广才叩许北龕达摩佛一尊，出瓦一千…”中就有“出瓦一千”的捐物记载。还有一些留存龕外的“本地石匠作头”“在街信士”“在城弟子”等都是城内居民为建造佛像或供养佛像出资、出力、出技术的历史见证。同时，四龕的不断增凿又在事实上形成了巴州城佛龕环绕的格局，增强了巴州的城市文化底蕴。就二者的选址而言，虽有先后之分，却在事实上形成了建造上互为补充的关系。

（二）在发展上存在相互促进关系

一方面，巴州作为历代州府治所所在地，其经济相对辖区其他地方更加发达，为四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开凿都提供了较

为有力的支撑。一些居住在城内富商及家境殷实的平民，自主成为了开凿佛像、供养佛像的信士，经常为石窟建造和寺观的建造者与管理者提供经济或物资上的支持，促进了环城四龕规模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在唐宋时期，较多的巴州主要官员都参与了捐资造像和妆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巴州的开窟造像之风。比如唐代的巴州刺史严武、巴州刺史郑公，户部侍郎张祜，化成县县尉党守业、化成县主簿张令该、宋代的巴南守杨概等官员都曾在四龕捐资造像。严武还因为南龕佛像的精美而主持修葺寺庙并求得了皇帝亲赐的寺名。唐代的皇族子弟李思弘、明代的巴州知州卢尔惇、清代的巴州知州吴灿纶都曾捐资对南龕进行过大规模妆彩；另一方面，随着四龕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名气的不断提升，又为巴城又吸引了众多外地的商贾、僧侣及崇奉佛教的信士，他们的驻足增大了礼佛膜拜的物质需求，也扩大了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需求，为巴城的发展凝聚了人气和商机。比如四龕中的供养人中就不乏“凉商”“泾阳商人”“秦西商人”“秦州僧”“直隶保定府人”“陕西某某”等外来人士。

（三）在文化上存在相互滋养关系

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包含历史遗迹、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居民宿、名人轶事等各种文化在内的综合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巴城四龕包含的众多文化元素，与巴州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形成了相互滋养的良好局面。其一，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石窟寺造像中包含了诸多如南龕满脸络腮胡

的胡人天王、高鼻大眼的双头瑞佛等外来文化元素，以及如建筑、绘画、器乐、宫廷服饰等隋唐时期中原皇家与北方地区的各类文化元素，让人们能够通过四龕造像了解更多巴州以外的区域文化，可以说四龕中的外来文化丰富了巴州的地域文化；其二，如脚穿草鞋的天王形象、慈善朴实的鬼子母形象、大量的佛帐形龕窟式样等历代巴州浓厚的地域文化元素也被能工巧匠植入了“四龕”之中，同样也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并作为佛教文化体系中的特色与亮点得以广泛传播，更多人又通过四龕了解到了巴州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其三，参与四龕文化建设的文人雅士与四龕之间也存在着价值共生的关系。历代频繁流动的文人雅士题留四龕的优美篇章促进了“龕因人传、人因龕传”、两相帮衬良好局面的形成，让四龕与文人雅士俱著声名。比如南龕的《严武奏表》在唐代中期将南龕“带”到了朝堂，严武又此被巴州州民感念，离任之后，州民还为他竖立了“去思碑”，让严武在巴州有了重要地位。近现代时期，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严武奏表》的同时也关注了南龕，关注了巴城四龕，巴中石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得到了有效提升；其四，历代州衙官员题留在四龕中的记事性题刻如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对巴州因战乱导致的史料失载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补史作用，滋养了巴州的文献史料。比如，清道光年间巴州代理知州朱锡谷在《巴州志·序三》中就提到了巴州史料因“州

以教匪之乱积年，多所缺佚。”^[11]，于是在修编《巴州志》时将“荒岩古刹，残碑断碣，搜剔殆遍”^[12]。朱锡谷的这段自序说明《巴州志》中部分史料的直接来源就是像四龕这样的荒岩古刹中的题刻题记，因此留存四龕中的史料又同衙署文献资料形成了相互补充和互为印证的关系。

（四）在宗教信仰上存在投射与寄托关系

石窟寺造像体现了物质载体与精神需求的紧密相连。一方面佛教“造像功德论”认为，开凿佛像可积累福报、消除罪孽，捐资人通过参与造像成为“福田”的播种者，期望获得来世善报。另一方面，崇奉佛教的信众也希望能够通过出资镌造佛像，表达对神灵的虔诚崇拜，从而实现祛病消灾、仕途顺遂、逝去亲人早登极乐等现实诉求。巴中四龕中有众多龕窟都承载了宗教信仰上的这种投射与寄托关系。比如南龕中有为消灾祛病而镌造的 65 号龕、69 号龕、71 号龕、95 号龕，有唐代巴州刺史严武为“奉报烈考中书侍郎远日”而开凿的 87 号龕，有宋代巴南史杨概为纪念父亲而镌造的 10 号龕；北龕有清代贡生李卓然为尊重父亲信仰和志向而捐造的 21 号龕，在该龕像旁，他留下了“…拜斜鬼神之说吾未深信，但先父志不可违也…庶先父之志慰而神亦因以有灵。”这样感人至深的造像铭文；西龕有唐代精通佛法的郭玄亮为父镌造的 10 号龕，在龕左的造像铭文中同样也可真切感受到郭玄亮对父亲的拳拳孝心：“菩萨圣僧金刚

^[11] 《巴州志校注·卷首》（重印本），巴中，2002 年，第 7 页。

^[12] 《巴州志校注·卷首》（重印本），巴中，2002 年，第 7 页。

等，郭玄亮毗季奉为亡考乘此徽因（美德、功德）速登净土，弥勒坐前同初会法，开元三年岁次乙卯四月壬子朔。”他希望逝去的父亲借着自己镌造佛像的功德早登极乐。佛法的传播和信众的寄托最终都交汇在了石窟造像上，因此，这些石窟造像不仅仅只是佛教传播者投射信仰的实物载体，也是巴城信士重要的情感载体。

五、环城四龕之于巴中的现实意义

（一）环城四龕是巴州辉煌历史的见证

纵观当今时代，凡是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无不是曾经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之地。比如承载着三千多年历史的西安，曾是中国十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称作“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长期都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的洛阳，长期占据了西周、东汉、隋唐等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枢纽地位。由于佛教和历代统治者的密切关系，有石窟寺分布的地方往往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之地。比如敦煌在东汉时期就是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加强中西交通的基地和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麦积山石窟所在地秦州（今天水）既是丝绸之路东段重镇，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和军事战略要地。云冈石窟所在地平城（今大同）曾是北魏都城，汇聚了草原丝绸之路和中原贸易的双重资源，是北魏皇室政治、宗教意图在艺术领域的集中体现。

同样，巴城四龕也是巴州辉煌历史的见证。其一，环城四龕是巴城居民经济殷实富足的见证：在古代，石窟寺的建造堪称一项艰巨卓绝的工程壮举，不仅一切全靠人力与手工推进，由于工期漫长，还需要养活大量的工匠、画师，购置各类器械和材料，没有强大的、连续不断的经济支撑是无法完成千年不朽的艺术珍品的。环城 300 余龕造像不是官方在同一时段中有计划建造的，也没有皇室或大贵族出面组织建造，而是无数殷实富足的信众经年累月自发捐资镌造或修缮的。四龕造像或妆彩题记中多有如：“财舍擅施”“爰抽薄升”“备青蚨之八十余千”

“捐清俸六十四千文”等关于捐资的直接记载；其二，环城四龕是巴州文化繁荣的见证：石窟造像是古代文化、艺术与信仰高度融合的结晶，建造期间离不开匠师的协作和文化精英的参与。每一龕造像的构图、雕刻和妆彩都是对佛教教义、宗教仪轨、雕刻技艺、绘画装饰等多种文化的理解和精湛技艺的展现，需要佛教文化传播者、石匠、画工、彩绘师等各类文化人才共同参与完成。同时，四龕之中至今还留存有如释子寂、如戒、海鸿等参与四龕建造管理的高僧姓名及严武、晁补之、赵公硕、吴琦、孙清士等众多文人雅士的题刻、榜书和诗文；其三，“光福寺碑”是南龕“走”进朝堂的见证。一个地方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载入史册是必然的，但非皇家石窟的其他石窟造像想要“走”进朝堂却并非易事。唐乾元二年，巴州刺史严武整修南龕寺，并上疏肃宗皇帝请赐寺名，严武在奏表中不仅言辞恳

切表达了为圣上祈福的忠心，还详尽陈述了南龕佛像的规模和精美完好的保存状况。肃宗阅之欣慰，准其所奏，御笔朱批“其寺宜以‘光福’为名”。肃宗皇帝为巴州南龕寺庙赐名“光福寺”绝对是巴州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也让南龕在唐代朝廷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一份“专档”文书。就皇帝赐名对当时巴州城市的影响力而言，敕旨赐名的“光福寺”带给巴州城市的是无比荣耀和满满的幸福感。

（二）“四龕福城”是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符号

在文化强国建设新时代，很多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有的是建筑地标，如故宫之于北京、布达拉宫之于拉萨、黄鹤楼之于武汉、东方明珠塔之于上海、宽窄巷子之于成都、六尺巷之于桐城；有的是饮食文化，如火锅之于重庆、早茶之于广州、牛肉面之于兰州；有的是历史人物，如孔子之于曲阜、鲁迅之于绍兴、李冰之于都江堰；有的是山水景观，如三峡之于重庆、西湖之于杭州、漓江之于桂林等等。其实无论上述哪一种文化符号，后面都会有大量的城市分属在不同的种类之中，唯有“四龕福城”这样的城市文化符号是很难再找到相似的分类。尽管如敦煌、大同、洛阳、天水等城市都因精美石窟造像而蜚声中外，但都不似巴中这般被佛龕几乎四面等距离环绕，可以说“四龕福城”就是巴中拥有的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符号。

（三）“四龕福城”是巴中未来发展的经济引擎

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符号的城市往往是一座最容易被关注和向往的城市，一个被佛龕环绕的城市一定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这必将成为人们探寻历史文化、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目的地。其一，城市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文化元素的植入，巴城四龕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先辈的精湛工艺，崖壁上的一凸一凹都有历史的回响，是历史上无数个精彩瞬间的开篇，深入挖掘四龕背后的故事，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能够增强巴州的城市文化气息，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其二，以四龕为核心强化环境治理、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环城石窟文化长廊，对四龕予以合理展示利用，能够优化巴中城市空间布局，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其三，环城四龕能够充分发挥巴中招商引资的“梧桐树”效应。独特而丰富历史文化遗迹往往都是投资者是否决定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西安的兵马俑、古城墙等文化遗迹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和投资者，成为了招引凤凰的梧桐树。巴中，地处南北旅游圈最佳对接带和成都、重庆、西安的旅游“金三角”枢纽位置，作为秦巴片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投资商人的关注。在2013年“影响巴中·追赶小康十大贡献人物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名为黄建惺的泉州商人就曾发表过这样的获奖感言：“之所以投资巴州，是南龕石窟震撼了我们。它向我们揭示了两个要素，巴州在历史上非常辉煌，这个辉煌跟米仓古道有关。辉煌的历史必有繁荣的经济…”这充分说明巴中悠久

的石窟文化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确实是城市形象塑造的强大助力，能够吸引更多投资商前来更好地投资建设巴中；其四，环城四龕的精美造像是自媒体达人的镜头聚焦之处，通过他们的分享、推送必将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为巴中文旅经济带来热潮，并进一步催生更多如交通、餐饮、住宿、演艺、文创等衍生消费产业的兴盛，为巴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传播了巴中历史文化。

小结

巴中环城四龕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民族文化精髓，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包含有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人文含义，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一道颇受青睐的历史文化景观、一份极其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更是巴中城市提档升级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和“硬件”。近年来，巴中环城四龕因其独特的位置分布、精湛的造像技艺和完好的保存状况让巴中石窟在我国石窟寺领域中声名鹊起，也让巴中这座城市的知名度得到了较快提升。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迎来大好时机的新时代，巴中四龕环城的分布格局给予了巴中“四龕福城”的新身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四龕福城”已经不单是不是一个佛教意义上的命题，而是千年历史积淀和当今美好时代赋予巴中发展的崭新机遇。我们应在保护好“四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四龕”的历史、文化价值，让“四龕”成为宣传巴中、赋能巴中、造福巴中的桥梁纽带，让“四龕福城”实至名归。

